

秘密与谎言

守秘时的我们经历着怎样的情绪？是好战的、羁绊的、封闭的、尴尬的、困惑的、强大的、被接纳的、特权的、坚韧的、偏执的、压抑的、亢奋的、危殆的、欺骗的、还是渴求的？我们如何应对所有这些感受？我们如何围绕着它们生活？我们如何对过这种生活带来的无数后果以及我们做出选择背后的潜意识原因保持警觉？[……]以及我们何时仅仅是为了形式和快感，而不是出于必要性，而在坚持保密？



No Trace Project / 无痕，无案。这是一个工具合集，旨在帮助无政府主义者与其他反抗者了解敌人的能力，削弱其监控手段，并最终安全地采取行动，不被抓捕。

基于您的情况，持有某些文件可能被定为犯罪，或引起不必要的注意。请谨慎选择打印哪些小册子，以及将它们存放在哪里。



祝好运，请照顾好自己和彼此，不要被捕！

秘密与谎言

原文为英语

Secrets & Lies

325 #7

2009

新版本

Ungrateful Hyenas Editions

2022

ungratefulhyenas.noblogs.org/post/2022/06/28/secrets-and-lies

简体中文（普通话）翻译

iYouPort

iyouport.notion.site/25234ca2d46d80838fb0f326e46a54aa

排版

No Trace Project

notrace.how/resources/cmn-Hans/#mi-mi-yu-huang-yan

目录

紧密相依 (Ungrateful Hyenas Editions)	3
秘密与谎言	7
附言 (实用建议)	16

的团体中滋长——例如每个人都熟悉的核心家庭。此外，与伴侣一起工作时要谨慎，或者至少要非常确定你们都能处理好相关问题。从长期安全角度出发，彼此间需谨慎行事。我们都认为亲密之人不会出卖自己，但历史上甚多残酷的镇压行动都在表明，人情世故变幻莫测——昔日的至亲至爱为了逃避长期监禁，竟会出卖亲友。

当(如果)警察突然找上门来，把你单独拖进牢房，告诉你“某某”说了你什么，或告密了什么，你过往对人性的认知将决定国家心理战对你的侵蚀程度。如果你曾目睹战友在斗争的压力下崩溃，表现出令你费解且不安的行为反应，你又如何确信当警察以更私密的方式施加恐怖时，他们不会重蹈覆辙？

国家镇压旨在分化、压倒和摧毁我们——你我生命中有哪些纽带维系着战友间的紧密相连？我们又如何处理彼此的弱点和局限性，又如何接纳彼此的优势？想想看，你与谁在一起感觉亲密？基于什么理由？

审慎地对待保密，要有分辨力：保密是真正必要的吗，还是关乎其他东西，比如权力和自我膨胀？

不要忽视权力动态：人们在特定时间可能处于较强或较弱的地位，如果有人看起来或感觉自己由于某种原因处于弱势地位，请尝试理解缘由并给予宽容。

我们不是机器人：所谓的生活私域与政治公域并非总是那么容易分离，尤其是在基于亲密和非正式性的团体/圈子中。但每个人都有差异——有人需更包容情感波动，有人则需提升情绪管理能力。如果你自认是易受不安、嫉妒、骄傲等致命罪恶困扰的“情绪化之人”，就必须主动掌控情绪，在矛盾激化前化解危机。如果你并非“情绪化之人”，也切勿否认他人可能存在这类特质——否则诸多问题将被掩盖，日后终将爆发出来。我所经历的这类人际问题实则反抗斗争的一部分：它提供了一个创造/实验新型社会关系的机会，也是一个让我们近距离观察到社会体制如何通过我们的行为和动态在我们身上上演的机会。如果我们勇敢地看待所有这些事情，我们就能深化我们的反抗运动，更长久、更强有力地战斗。

紧密相依 (Ungrateful Hyenas Editions)

安全文化最美好的状态是能够共同创造保护我们彼此的实践，通过建立信任让关系开放，从而促进协同行动的可能性。这让人感觉像是在滋养一种共谋和团结的精神，不仅限于我们身边的同志，更是延伸到世界各地与无数无政府主义者和反叛者相连。每一位散播反抗火种的人，都与他们信任的同志一起守护着宝贵的秘密，正是这些秘密让我们的斗争永续。

然而，在实践中，这不可避免地会充满混乱和艰辛。要发展出共享互助的、无等级无支配性的理想相处方式，其过程可能会显得笨拙甚至令人沮丧。我们的沟通技巧和自我反思能力不可避免地会在考验中磨砺。秘密压在我们心头，使我们孤立。它是一个负担，尽管是我们尽力共同承担的、必要的负担。

但当安全文化停止动态流动，不再植根于我们彼此的承诺与斗争的共同实践，而演变成一种模棱两可的、甚至主要是美学上的亚文化仪式时，它就变成了一种腐蚀性的液体，浸入并加深了渗透这个世界的威权主义、等级制度和自我中心的裂痕。这可能会危及经过多年培养的共同行动潜力，也会危及我们每个人的安全——安全文化本该守护的核心。当这些裂缝崩裂扩大时，它们就很容易被用作渗透的切入点。当我们的共同立足点在我们脚下崩塌时，我们就有跌落的风险，彼此间的关系被撕裂的风险，被统治系统等级制度秩序重新吞没的风险。

《秘密与谎言》的作者就是一位跌入裂缝的人。在暂时远离这种保密文化之后，作者反思了这种文化可能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它本可以或应该可以呈现的另一种面貌。

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去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它们是保护我们彼此和共同潜能所必需

附言（实用建议）

我写《秘密与谎言》是在一年前。在那一年里，我完全退出了政治圈子，远离了我所认识和认同的所有人与事。我深思了引发《秘密与谎言》的处境和政治场景：反思我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其他扮演角色的角色。当然，我们都有权决定不再与某人合作，而且我们都必须学会在某个时刻从排斥者和被排斥者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以下是关于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做得更好的几点思考。

当我和我的同志之间的关系开始瓦解时，我们确实定期进行过沟通，并尝试继续一起合作项目，只是不涉及高度“敏感”的项目。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试图重建彼此的信任、信心和理解。我推荐这种做法，尽管在本案例中它没有奏效。

不要假定中立立场：如果你需要在情感复杂、涉及多方的困境中寻求建议，请思考所涉及的关系，以及你在做选择时对某些行为/反应（如操纵和/或剥削性的行为/反应）赋予了什么样的价值观和判断。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坦诚地告知被排斥者其处境，并承认这种排斥带来的影响。除非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否则应该告知被排斥者任何关于他们的讨论，或者更好的是，让他们在场，以便他们能够参与决策并在需要时提出质疑。将某人排除在行动之外是很难的，如果继而又使其在充满安全隐患的处境中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不仅对其本人的情感健康、并且对所有人的安全都构成不负责任的行为。

如果被排斥的人是你，并且你觉得自己有必要就此进行沟通，包括弄清楚别人怎么看你、你的立场是什么，那么请商定可以和谁谈论这件事。你可能需要主动一些，因为其他人可能感到尴尬、不确定是否可以谈论，或者选择逃避。如果可能，安全地请一位来自附属亲密团队或另一位来自共同认可的圈子之外的可信赖人士来倾听。虐待和权力滥用模式经常在封闭

需要你畏惧的存在。你与其他所有人被根本性地分离、解离。你的对话因那些未言明的、不可言说的内容而变得灰色沉重。你们彼此太亲近，但却又永远不够亲近，既被孤立，但又不够孤立。你生活在一个以匿名为特征的世界里，但又不够匿名，以至于你所守护的秘密、分享的隐情、以及你所推崇的同谋者所带来的影响，无法向你的“前”亲密朋友的“现”被排斥者隐藏。与秘密圈层之外的人的交流不再自由，因此对秘密圈层的依赖循环愈发加深。所有让你感到困扰的关于秘密或关于这个滥用权力的团体的问题，都无法被谈论，导致更深刻的孤立感——除了那些同样守着秘密、却正是不安根源的同伴。当你被这样隔绝于世，认定世人“皆不可信”时，偶尔会不禁自问：“我究竟在为谁而战？”

这是几个月来你第一次让我关掉手机，以便我们可以自由交谈，这份被接纳的感激之情竟令我作呕。

守秘时的我们经历着怎样的情绪？是好战的、羁绊的、封闭的、尴尬的、困惑的、强大的、被接纳的、特权的、坚韧的、偏执的、压抑的、亢奋的、危殆的、欺骗的、还是渴求的？我们如何应对所有这些感受？我们如何围绕着它们生活？我们如何对过这种生活带来的无数后果以及我们做出选择背后的潜意识原因保持警觉？与那些无需守密的人相处时，我们又该如何定位彼此间的关系？选择守密伙伴的依据何在？我们在守护的是什么秘密？以及我们何时仅仅是为了形式和快感，而不是出于必要性，而在坚持保密？

秘密的世界是情人专属的天地。它承载着亲密与共谋，交织着政治与私情。置身于这样的情人关系之外可能是一种折磨。尤其是当他们曾经也是你的情人时。处于这样的情人关系之内也可能是一种折磨。尤其当其他情人被排斥在外时。

我知道我终将遇到新的情人和其他的秘密。但我会尝试以不同的方式去面对。怀着对先驱者的敬意，怀着对成熟历程的尊重，在深刻认知彼此伤害之广度的同时，我们需要将隐秘性与人性相结合，并保持对内在与外在体系的持续警觉。

的吗，还是仅仅为了表明我们属于某个排他性的小圈子？两者往往同时存在，但（通常是真实的）镇压威胁在我们脑海中制造的刺耳喧嚣可能过于响亮了，以至于淹没了所有的个人和集体的反思。于是我们回避对这个痛苦问题的追问——我们对同志的信任、我们的自我认同，抑或二者兼具，是否如此脆弱，以至于我们需要这些持续的信号才能感受自身的价值？

我想在作者的反思的基础之上，再补充一个我观察到的会助长这些动态的规范。激进派反叛者常以（必要的）秘密为借口，来为自己情感上的斯多葛式封闭做辩护。他们是如此坚定的革命者，以至于他们的整个生活都被秘密所笼罩了。这种方法并非来自无政府主义革命图景，相反，是承袭自我们都成长于其中的父权文化，这种文化教导我们压抑情绪的能力是衡量力量的标准。恰恰相反，这种文化规范已被证明是我们运动中的一个巨大的脆弱点，并且是完全不可持续的。那些精于掩埋情感的同志逐渐变得病态、孤立、偏执甚至具有虐待性，而那些不能或不愿将内部挣扎隐藏起来的人则被推向边缘。

这并非否定根据心理/情感状态重新评估和调整安全协议的正当性或必要性。诚然，有时我们确实无法承受行动压力，那就不应该参与其中。相反，我们对激进派圈子中精神和情感健康的理解不应塑造军队式的那种理想士兵形象，而是应该反映我们反威权和反父权的价值观，以及我们对自由互信的亲密关系的渴望。我们每个人都有情感，我们都被这个世界折磨得支离破碎，都需要面对这些困境——不仅是那些明显精神失常者。而且我们的愿景必须着眼于长远——如何让正在构建的关系及其催生的美丽反抗持久延续，而非仅限于短暂爆发？

正如我们在街头需要战略智慧一样，我们也需要情绪智慧来避免传播这个社会灌输给我们的毒液，并以富有创造力的方式应对不可避免的冲突。这种智慧必须通过实验、分享和关怀来积极培养，而所有这些都取决于我们学习和成长的意愿。

我们许多同志对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和机构持怀疑态度，这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们厌恶精神病机构的暴力，或者曾经直接或间接被这些机构伤害过，或两者兼有。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看治疗师，对于需要的人来说，机构心理咨询也并不是万灵药。重要的是达成共识：我们都有责任去寻求某种形式的支持。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能谈论，但这正是我们更需要处理可以谈论的事情的原因。童年创伤、人际冲突、被遗弃的恐惧、成瘾行为、及其他有害应对机制、被囚禁的创伤——这些未解决的问题会悄然侵蚀心灵，尤其在反抗者时常必需经历的高压时期。

我最近偶然听到一段对话，A 说每个人都需要去做心理治疗，而 B 回答说：“反抗项目就是我们的治疗”。另一些朋友研究了躯体疗法和如何调节神经系统。纽约的同志们开始了共同咨询小组，训练自己在一个彼此信任的环境中互相提供支持。有针对酷儿群体、成瘾者家属、性暴力幸存者的支持小组。寻求支持的方式有很多种，谈话疗法只是其中之一。所以当一位同志拒绝尝试或找借口时，我将其视为一个危险信号，也是潜在共识的一个重大障碍。即便当下无法为自己做到，我们也应当为同志们努力尝试。

的另一边。因为我不再被视为合格者。因为我的爱人离开了我，友人亦弃我而去，因为我感到不得不离开共居的屋舍却无处可去，我身处一个陌生的地方，不是我长大的地方，说着我不懂的语言。更因我在重压之下有些崩溃，我不再被认为适合行动。我被少数人秘密地、在我背后的谈话中评判了，没有经过任何正当程序，直到我追问才被告知。我认识那些迹象、眼神、那些暗语。只是它们不再指向我。曾经视作抗争必备的归属感，此刻却愈发像是一场表演。一场保密的奇观，其动机之一似乎是向他人展示他们被排斥的状态，以及那孔雀开屏般的“被接纳”。突然间，在这个对一切都有见解的反叛者世界里，突然无人发声了：不问发生了什么，谁做了决定又为何如此，你身在何处，是否安好，是否另组团体，我们该如何应对？……提问本身被禁止了。尽管有些人仍是“朋友”，但背叛的泥沼和异样的共谋在彼此间散发着恶臭，友谊无法跨越这道鸿沟。

我不想再成为某个圈子的一员。我只想再次被接纳。这里没有团结感，没有亲近感。只有愤怒与无力。只有孤立和抑郁。只有精疲力竭。只有骄傲。只有挫败。守密者的笑声带着秘密的狂妄，他们的身体因谎言而傲慢。他们的眼睛看向除了我之外的所有地方，而我这辈子，穿过监狱、穿过逮捕、穿过袭击、穿过暴动、穿过激烈的辩论，之后，我却第一次，没有了同志。

在研究中观察到，在实验过程中经历被群体排斥的人感觉身体更冷。当被要求评估房间温度时，他们报告的平均温度比被群体接纳者更低。当被要求从一系列食物和饮料中选择时，那些被排斥的人请求更多的热食和热饮，远超过被接纳者。

即使我身处秘密之中，即使我被接纳，我仍感到不适。这就像身处一个充满虐待的家庭中，家庭之外的每个人都是你不能透露任何重要事情的对象。在一个充满秘密与谎言的世界里，其他所有人都是“他者”。其他所有人都是未被纳入的、不被信任的、不受欢迎的、没有特权的人。其他所有人都是

权威、等级制度和个人的不安全感倾向。这可能是破坏性的，足以令人瘫痪。我们需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在任何其他世界中，这种保密的生活，本质上是这种与他人相处的方式，会是我们主动选择的吗？如果是，缘由何在？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被强加的局面所造成的损害，并在这个过程中寻找到合理化依据？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现在正在创造的是什么样的世界？如果我们在当下继续互相伤害，难道真以为未来某个解放时刻这一切会奇迹般地改变吗！？

今日，我无法言语。心悬于喉。颈部以上都已麻痹。我的喉咙。我的嘴巴。我的舌头。我的嘴唇。我的言语。我的思绪。交流已不复存在。诚实也已停止。取而代之的是眼神、暗示、猜测、狡黠的微笑、手势，是人们将另一些人拉到一边，远离那些可能被允许知晓或永远都要蒙在鼓里的旁观者。我永远无法确定自己是否理解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无从查证。混乱在蔓延。安全被搅乱并洗牌。没有逻辑可言。有些地方可以公开交谈，但似乎并不比禁言之地更安全。而决定边界的人们，既无章法也无澄清。唯有偏执与迷茫。被排斥的恐惧，被接纳的庆幸。权力与自我交织。每当我开口说话，都会感到一阵恐慌。每当我张开嘴巴，都能感觉到脸颊因恐惧而发烫。每一次在话语落下后闭上嘴巴，每一次打电话给某人，每一次按下电子邮件的发送键，我都能感觉到肾上腺素的飙升。就连最简单的表达也伴随着这种感受。甚至似乎如果没有这种感觉我就再也无法说出任何事。我的舌尖干涩，思绪纷乱，嘴唇僵硬。我半遮眼帘以便与你同步。这被称为模仿，它在社交排斥的情况下潜意识地发生，作为安抚或讨好排斥者的尝试。每一次互动都沾染着法庭般的猜疑、自我意识和恐惧。每一段友谊都变成了一座监狱，我们隔墙相望。情感也在消逝。

我曾以为我们是反叛者。如今却成了站在操场边缘的少年，困惑为何无人再与我嬉戏。操场对面是我曾经身在其中的小圈子。一切一如既往。唯独我已不在其中。我在这里。在外围。在那些不久前还是我的朋友、爱人、同志的人所筑起的高墙

“我们都带着恐惧降世

至今仍在寻觅言语

来描述那份痛楚

我们紧紧依偎

像雨中的鸽子

(紧紧相依)

互相用羽翼温暖胸膛

(紧紧相依)

用磨损、开裂、沾污的喙

(紧紧相依)

所以这首歌献给那些迷失的人

(紧紧相依)

和那些逝去的、那些离去的人

(紧紧相依)

我们所有破碎的兄弟

(紧紧相依)

和跌倒的爱人

(紧紧相依)

向雨水吐着口水

(紧紧相依)”

— “紧密相依” (Hang On to Each Other), 加拿大摇滚
乐队银山锡安

秘密与谎言

接下来的这篇文章来自一位参与直接行动和非正式组织的无政府主义同志。在起义亲和（insurgent affinity）的关系中，当欲望与爱意交融于共同进击这个专制社会的真诚冲动时，我们必须关注我们行动的后果，以及我们所牵涉的人。要理解统治秩序的即定逻辑。当万物终将崩解之时，我们必须找到维系彼此的方式，避免被瓦解抗争意志。

“冲突的心理维度与物理维度同等重要。冲突是意志的较量，既发生于战场亦存在于人心。冲突是权力的角逐。权力可表现为政治（意识形态）、军事或经济（物质）形态。基于意识形态的冲突堪称最残酷的较量。人们的态度与行为（无论友敌或未决者）终将决定冲突的走向。”

— 加拿大武装部队《心理作战联合条令》

我曾栖居于半影之界。一个充满秘密与谎言的世界。一个不可言说之地。一个不容发问的场所。一个充斥着迟滞反应、阴谋诡计和欺诈的空间。江湖帮派小圈子在这里巩固自身。权谋之术在“必要性”的幌子下上演，同志们或在窃窃私语中被逐出局外，或在无声中被隔绝于圈内的边缘。唯有“适者”得以存续，其余者皆遭弃绝——无论是挚友、爱人、抑或仇敌。你会亲眼看着亲密伙伴的眼睛里闪烁着搜寻恰当措辞的惶恐，为绕开真相而迂回的话语，而同时，你自己也对他人做着同样的事。有时，你甚至连那样的眼神都看不到，一切都被伪装在阴暗的深刻中。你能窥见其中的运作机制，却无法言说所见。正如你以千万种方式信任对方，却无法吐露所知。这就是提问即犯罪的地方。在这里，你被剥夺了发声的权利。在这里，真相无处容身。尤其是当你未被纳入“核心”、遭人排

——我们就已经沦为依赖者了，无论是三岁的孩子还是六七十岁的老人皆然。

我们鲜少能认识真实的自我，梦想与渴望永远无法自由绽放。这种生存状态导致人类陷入永恒的未成熟境地。

人类将不顾一切地争取自由、力量和自我实现。作为青少年，我们通过组建团体、入会仪式、制服和服装标志以及共同的标准、身份认同和创造独特的秘传知识来实现这一点——亚文化。显而易见这种封闭隔离包含了固有的反动风险，就政治团体而言，除非我们想保持微小并复制那些阴险的权力结构，否则，我们最好能早点意识到这些结构和行为的心理影响。

生活在发展停滞的状态中，并不是在重新找回完整的人性。

“心理战（PSYOPS）的三个基本目标是：

1. 削弱敌人或对手的意志，通过在其内部制造怀疑、异议、和不满，来降低士气和效率。
2. 增强友好目标受众的情感认同。
3. 争取未承诺的或摇摆不定受众群的支持与合作。”

— 加拿大武装部队《心理作战联合条令》

所有保密文化都会遇到问题。如果它们关乎效能和安全，那么它们就需要不时地进行审视。即使是中央情报局也承认高度保密造成的心理和效能问题。一份报告甚至提出，保密实际上会导致不安全感 and 低效：非敏感信息与绝密信息一起被封存，从而导致行动失误、不满和不必要的权力博弈等问题。

当我们开始允许病态的保密文化滋生，那么，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某种程度的人类健康、相互尊重和团结、自我（亦指更广义的同志集体）实现和自主性，我们就需要不断警惕我们的动机以及我们对待彼此和整个世界的方式。

由于我们投身“激进主义”的方式非常非正式，有时甚至是偶然的，这种状态常缺乏充分的自觉、讨论、觉知或正式引导。无论在秘密圈子之内还是之外，都存在着一种人际关系紧张、偏执、归属稀缺性与排斥感、士气低落、孤立感或特

的。研究表明，保密对成年人的影响极具破坏性，会导致孤立感、抑郁和身体不适（无论守密者或非守密者皆然。守密者可能是看门人，但他们也是自己知识的囚徒）。在任何政治激进场域中，保密文化和帮派心态的负面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有趣的是，针对青少年的研究表明，保密在他们从儿童到成人、从依赖到自我实现的过渡中，可以是一个积极因素。如果我们将此视为对当代一些抵抗团体的隐喻，便能理解保密作为一种选择的意义。在这个剥夺我们的情感、自我掌控能力与生命意义的世界中，保密文化可能不仅仅代表着一种战术上的需要，更是一种心理上的需要。正如青少年通过隐秘行为绕避权威者（父母、教师等）以实现个体化，从而开始彰显自身独特性与自主性一样，政治群体中的保密文化也有可能——除了是对镇压的反应以及保护自己免受监视和行动的法律后果的需求之外——是一种类似于青少年阶段的无意识过程。

“[……]保密是青少年福祉和心理健康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机制[……]它独立地有助于青少年的心理社会福祉，并且似乎是青少年自主感的核心因素。”

当这些团体努力对抗国家、司法机构、企业工业界和军事霸权等压迫性权力机构，主张其个人和意识形态的自主权时；当他们努力“与他们的主要看护者[国家以及家族、教育和规范化的社会结构]保持距离，并脱离关系，在‘自我’和‘非自我’之间建立界限（Kaplan, 1987）”并“建立和巩固他们的自我调节和自我决定能力（例如，Allen et al., 1994; Larson et al., 1996; Steinberg and Silverberg, 1986）”的时候，这些政治圈子选择保密，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反应，一种避免因攻击国家而被侦查和惩罚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界定自身差异、创建独立派系的方式。

镇压有许多面孔，身体暴力和监禁威胁只是其中之一。极权体制的另一种压迫形式，是制度化的幼稚化与依赖性不断加深的进程。从最基本的需求开始——即温饱出行自我教育等

挤时，便只能栖身于秽语症般的臆测、否认、不安、挫败与偏执的维度上。透过这层秘密与谎言的筛子，透过我们社会关系织锦上千疮百孔的破损，我们会迷失自我。我们会失去彼此。在诚实已然止息的地方，我们成为了自己的囚笼。

“我们知道，保密行为的本质会侵蚀践行者的个性。对于所有形式的保密都是如此，从原始的秘密社团到密语隔间¹。后者是一种强化形式的保密，在许多方面类似于前者。它带有秘密社团的光环。它有入会仪式、誓言、深奥的”行话“、隔离区域，以及层层嵌套的秘密。取代暗语手势的，是徽章上的字母代号。这里有圈内人和圈外人。难怪密语隔间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心理效应。”

— 1977 年 3 月的一份报告《中央情报局密语隔间批评》

难道我们认为国家在保密方面的专业程度，不如它对战争的精通吗？全世界每个国家的秘密部门工作人员，都对保密制度给守密者以及无权接触秘密者的心理带来的压力和影响有着第一手的经验。难道我们认为，在耗费千年磨砺刀刃之后它不知道该以哪个角度、切割哪块血肉才能得到最好的肉质吗？构建秘密就是构建高墙，就是构建评判，就是将我们彼此分离，就是播撒不满、猜疑和偏执，就是隔离那些敢于直言现状者与可能倾听者。因此，国家又写下了心理战的新篇章。创造一个播种秘密的花园，实则是播撒权力与腐败的种子。

在其他时代以及在当下的某些地方，必要的秘密活动是需要宣誓的。国家处决人们，不仅因为他们采取行动，很多时候仅仅因为他们对一个从事反国家行动的组织宣誓了保密誓言。而在那些秘密组织中——例如斯温船长（Captain Swing）、卢德分子（Luddites）、莫莉·马奎尔斯（Molly Maguires）、爱尔兰共和军（IRA）——规则始终明晰。有流程、有仪式、有入门和除名，不仅针对战士，更涵盖他们的家族和社群。负有责任的行动也许不是我们对抗国家的首选方式，但选择保

¹隔间（Compartment）：指代一个高度机密的信息系统，信息被严格隔离，只有被明确授权的人才能访问。密语/码字，指代秘密任务或人员。

密本身并非力量。这是一种无奈的必要，也是国家精心营造的一种存在状态，正如可追责性，这种状态同样契合其统治的需求。

在一个充满秘密与谎言的世界里，存在着一个影子的世界。影子是黑色的、冰冷的、扁平的。它们不会流血也不会哭泣。它们没有质感，没有色彩。它们拥有人类的轮廓，但缺乏灵魂。在这场影子的游行中，有一种虚假的强大。当个体试图通过国家提供的半成形入门仪式来实现自我时，就是他们被去个性化的时候——这些仪式将人类所有本能（包括坦诚的本能）定为罪行。

在某种程度上，在缺乏真正的亲密和情感色彩的情况下，影子们彼此交融。在一片黑暗的模仿中，在这种统一的逃避孤独和孤立的方式中，影子们合为一体。形成一道对抗“他者”的高墙。

“拉尔森与查斯坦（Larson and Chastain, 1990）发现，保守秘密的性格倾向，也被称为自我隐瞒，除了与身体和心理问题相关的压力因素（如创伤经历或缺乏社会支持）之外，还会导致直接的身体不适和抑郁。基于这些发现，拉尔森和查斯坦总结道：保密，无论所保守的秘密类型如何，都‘会付出代价，并起到内在压力源的作用’。针对成年人保密现象的研究和理论表明，保密所带来的身体、心理和社交劣势，可能是巨大的。”

就其本质而言，保密将保守秘密者与被蒙在鼓里的人分离开来。保守秘密者就是看门人。他们必然需要对周围人的品质、可信赖性以及是否达到值得被吸纳的标准，做出判断和评估。保守秘密者及其对其他秘密持有者的筛选并非中立。而是充满着权力。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我们就必须对我们的保密行为保持谨慎。

通常，由于我们的政治网络具有极强的非正式性、加之政治世界与社交世界的密切交融，我们对保密措施的使用意味着我们可能会对什么是机密、什么不是，谁是机密人士、谁不是感到困惑。又因为政治派系与社交团体和生活集体并存且

交融，彼此之间存在大量的交叉，所以那些暗示保密的行为往往昭然若揭，再加上自我意识的驱使，这常常会演变成一种表演，一种权力的展示和人际偏好的表演，最终不过是一种粗糙的拉帮结派心态。我们假装中立和严肃，但如果将我们的行为和流程与二十世纪初的波兰无政府主义团体“革命复仇者”进行比较——该组织的成员甚至被禁止在工作场所表达政治观点，以免危及组织的秘密活动——也许他们会被指责为先锋主义，但他们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选择某个人作为秘密守护者，往往是因为此人具有吸引力、令人向往、有地位有声望、穿着得体、阅读正确的书籍、行为举止合宜、拥有某些人脉，以及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也可以基于同样的理由而孤立他人：因为我们不再喜欢他们，不再与他们亲密，因为另有其他人更让人兴奋，因为其他人有更高的地位和声望，甚至仅仅因为我们中一些人善于操纵社交网络，擅长趋利的“站队”。亲密团队模式具有重要的功能和优势，但不可否认也同时有其缺点。其中之一就是缺乏个人政治问责制，以及大量松散关联的小团体——这些团体的成员可能对其他团体中的个人没有亲近感或责任感，从而可能导致缺乏尊重的流程，隐秘的个人动态在暗中滋生，当人际或政治问题出现时，没有第三方调解的可能性来减轻权力滥用。由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当一个人被排斥时，这个人没有“圈外”的人可以倾诉和疏导，这就会让他们陷入双重的孤立——首先因为他们的政治观点和生活而被整个社会隔绝，现在又被这个本该是同志的团体所隔绝。

在激进主义圈层中盛行的亲密团队概念，比任何其他政治形态都更凸显个人与政治的复杂纠葛——这是我们多数人难以应对的敏感议题。

秘密与谎言的代价高昂，它要求保守秘密者和被排除者（其中可能包括前保守秘密者）动用否认、分裂和解离等心理防御机制。我和多数人一样通常认为保密文化关乎安全：是对镇压的必要反应。但我也有一种感觉，它关乎不止于此。如果缺乏充分觉知，秘密本身可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目